

# 元朝时期权力对蒙汉翻译译者文本选择的操控

金 玲

(西北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30)

【内容摘要】进入20世纪50、6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新学派和新观念层出不穷,显示了翻译研究多样化的特点。在西方,权力与翻译关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90年代译学“文化转向”以来,突出权力问题的重要著作相继问世,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转向”已成为“文化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史和译法的讨论都开始关注权力对翻译的影响。对于中国译学界来说,“权力转向”仍然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其中所蕴含的一些新的理念、范式、案例等,都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所揭示的一些问题和现象,在蒙汉翻译活动中也同样存在。然而在蒙汉翻译研究领域,从翻译与权力视角进行探讨者寥寥无几。本文将从翻译与权力关系入手,主要以元朝时期蒙汉翻译译者文本选择为例,试论权力对蒙汉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给蒙汉翻译研究做出新的尝试,拓宽研究视野。

【关键词】权力 文本 操控 元朝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8-0109-03

元朝时期,在蒙汉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是极其有针对性的。这种针对性是基于为元政权服务的准目的。这是因为从事翻译活动的译者要么本身在各类政府管理部门出职当官,要么就算没出职当官也是在这些部门充当译史或通事。无论哪一种情况,作为翻译活动中的译者时,他们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的制定、具体翻译方式方法的取舍甚至译文的出版印刷等等,都会受到客观社会权力的左右。而这时,译者本身对于翻译活动各个方面所持的主观权力只能让步于译者本身所处的社会权力的操控。

## 一、汉本典籍的选译

元朝统治者属于游牧文化者,他们统治农耕文化的中原地区,必须讲究一套“御民”之术。儒家经典提供了不少古代帝王安邦治国的方略,因此他们有必要向之求教。元世祖在至元元年就开始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赡之。其后又置经筵译文官,向皇帝讲解经史之类,正如《元史·虞集传》中所说,“经筵之制,取经史中切于心德治道者,用国语、汉文两进读”。英宗硕德八剌时,虞集和王结两人就是经常执经以从的。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时,邓文原所讲的是《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书。当时译者们选译各种典籍的具体细节如下:

### 1.《大学衍义》

赵璧,字宝臣,云中怀仁(今山西省怀仁县西)人。世祖为亲王时,邀他入幕府,教蒙古生徒十人学儒,并命他本人学蒙古语,翻译《大学衍义》,世祖经常在马上听他讲解此书<sup>[1]P3747</sup>。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曾派人四处搜求儒家经典。有人进《大

学衍义》,仁宗命詹事王约节译此书。仁宗说:“治天下只要这本书就够了”,因此他下令将《大学衍义》与《图象孝敬》、《列女传》一同印行,赐给臣下<sup>[1]P608</sup>。

### 2.《孝经》

大德十一年(1307年)八月,“中书左丞索罗铁木儿以国字译《孝经》进”。武宗海山下诏说:“这是孔子的微言,从王公到老百姓都要按此书行事。我命令中书省刻板模印,自诸王以下各赐一部。”<sup>[1]P486</sup>据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元刻用畏兀儿蒙古字翻译的蒙汉合璧本《孝经》。

### 3.《贞观政要》

察汉,西域人,博览强记,通晓诸国语言。仁宗时,他曾译《贞观政要》进献,仁宗非常高兴,诏令缮写若干份,遍赐大臣。文宗图帖睦尔又“命奎章阁学士院以国字译《贞观政要》,刻板模印,以赐百官”<sup>[2]P210</sup>。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时,曹元用又译“唐《贞观政要》为国语。书成,……行于世”。

### 4.《尚书》

徐世隆,字威卿,陈州西华(今河南省淮阳县)人。中统四年(1263年),世祖问他尧舜禹汤的故事,他根据《尚书》载的内容作答。世祖要他将《尚书》“直接进读”。书成,由翰林承旨安藏“译写以进”(《徐世隆传》)。这是《尚书》改写本的翻译。据载,安藏通诸国语。仁宗诏令元明善节译《尚书》中有关政要的部分。元明善集贤直学士文升一同译润。译成后,每上奏一篇,仁宗都称好,说“二帝三王之道,没有你们我是听不到的啊。”元明善,字复初,大明清河人,官至翰林学士。

### 5.《帝范》、《忠经》、《帝戒》、《帝训》及其他

\* 作者简介:金玲(1979—),女,西北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学院讲师,硕士。

《帝范》和《忠经》是察罕负责翻译的,见《元史·本传》及《元艺文志》<sup>[2][P210]</sup>。《帝诫》是但泽和许敬忠二人编写以备经筵进讲的。泰定帝命译此书以进。《帝训》本是汉文本《经世大典》的第二部分,辑录了元代文宗以前诸帝的言论教诫。泰定帝命翰林承旨阿怜帖木和许敬忠合译此书,改名《皇图大训》,“敕授皇太子。”<sup>[1][P3747]</sup>

此外,泰定三年(1326年),泰定帝诏翰林侍讲学士阿鲁威、直学士燕赤译《世祖圣训》,以备经筵进讲。《世祖圣训》原是汉文本,记忽必烈的言论训诫,在修《世祖实录》时集辑的。这里顺便谈一下中央蒙古国子学和地方蒙古字学的课本问题。这两类学校都是以《通鉴节要》的蒙古语译本为教材的。由此可见,无论元朝时期皇帝们向之以求教的典籍还是学校学生的课本的翻译,无一不带有政治权力操控的烙印。因为这些汉本典籍的翻译,完全是在皇权的受意下进行的,通事及译史作为译者,其自身对于翻译文本的个体选择权力让步于皇权,政治权力对于文本的选择进行了严格的操控。

## 二、诏书、制诰、官方公文的翻译

元世祖忽必烈在蒙古新字制定之后,便规定诏书及官方文书一律以蒙古文为正本,附以各地区的文字。因此,诏书之类必须译成汉文。但也有例外,如世祖命程钜夫草诏求贤于江南,就是单用的汉文。诏书、制诰、官方公文、信件的翻译对于上意的下达及下意的上呈起到了桥梁中介的作用,为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而这类文本的翻译选择权也在权力的操控之下,是必须翻译的文本。见下列历史材料:

1. 照那斯图先生的《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sup>[3]</sup>第二册,搜集的元代文献包括皇帝圣旨、皇后懿旨、太子令旨、帝师法旨、碑刻、书页等40种。其中公文类有27件,与宗教有关的3件、牌子类4件、书籍类2件、其他散类有4件。27件公文中19件被刻在碑上(其中12件被译为元代白话文),未经刻印保持原貌的有8件,其中2件面向汉地、6件是面向藏区颁发。这些公文里注明年代的有23件,其中单纯用地支表明的有17件,在皇帝即位年顺序上加地支的有6件。可见元代八思巴文文献中的纪年法和其他文文献一致,尚未超出蒙汉两种系统。

2. 蔡美彪先生的《元代白话碑集录》<sup>[4][P4]</sup>中近百个碑文(目录上有94个,附录上有17个,其中有的重复)。据编者称,这些碑文都是自蒙古语翻译而来的,文字很难通读。从编者序言、说明和注释中可以了解有关这些碑文的背景、特征和分布情况。按年代前后顺序编排的碑文自1223年至1366年,含143年。当时占据中原的蒙古统治者向北京、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云南、江苏、湖北等十几个省市以及它们的下属地区和寺庙颁布的各种指令,不但立刻达到该地而且还及时立碑刻文,让百姓遵守,不得怠慢。这些碑文上的纪年法的翻译说明蒙古人在统治中原的一百多年间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当他们向所有的属民特别是向人口众多的汉族人民发号施令时,不得不考虑对方的文化与风俗习惯,兼容吸收与摒弃的措施。当然,起先用蒙古文草拟的指令被翻译成另外一种民族文字时,有些蒙古

用语要加注释,有些则以本民族的习惯用语给予替换,才能让读者更容易理解。总之,无论具体内容的翻译运用了什么具体的翻译方法,但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诏书、制诰、官方文书等的翻译毫无疑问地对蒙古政权开展有力的外交关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涉及到国家秘密,蒙古政权对于这类文本翻译的操控是绝对的,力度是超强的,体现了社会权力对于译者文本选择的绝对操控。

## 三、汉族大臣奏章的翻译

由于元朝诸帝及蒙古大臣多不识汉文,因此汉族大臣所上奏的奏章必须经过翻译,再呈御览。这对于下意的上达起到了桥梁媒介的作用。例如:

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在五台山大兴土木,建造佛寺,皇太后将亲自临幸。当时的监察御史真定人李元礼上疏谏止。奏章呈上以后,台臣不敢奏给皇帝,看来是没有翻译成蒙古文。到大德元年(1297年),侍御史万僧因与御史崔意见不合,设法陷害,便到架阁库里把李元礼的奏章取出,上奏成宗,说:“崔中丞与汉人李御史结成死党,诽谤佛法,指摘不应在五台山建寺。”成宗大怒,派右丞相完泽、平章政事不忽木等人审讯李元礼。不忽木把这一奏章译成蒙古文,读给完泽听。完泽说:“李元礼的意见与我相同。当年我就是用这类的话谏过太后的,太后没有听从。”他们把情况向成宗回报。成宗深思很久,说:“李御史说的对。”于是罢了万僧的官,恢复了李元礼的职。

此外关于奏章的蒙译问题《元史》中也有相关记载。如,《元史》卷102《刑法志·职制》载:“诸内外百司五品以上进上表章,并以蒙古字书,毋敢不敬,仍以汉字书其副。……诸内外百司应出给札付,有额设译史者,并以蒙古字书写”<sup>[5][P395]</sup>。

## 四、国史的编译

元代的各朝都曾组织力量编写前一朝的历史,名为“实录”,还纂修过《经世大典》。这些国史都是用汉文写的。但元代国史,还有一份是用蒙古文记录的,记成吉思汗前后的蒙古史实。

文宗在至顺元年(1330年)委任赵世延、赵世安纂修《经世大典》,“专命奎章阁阿怜帖木儿、忽都鲁都儿迷失等译国言所记典故为汉语”<sup>[1][P749]</sup>。世祖以来,始有实录。但仁宗即位后,曾“命察汗译《脱卜赤颜》,名曰《圣武开天记》”<sup>[1][P3029]</sup>。这是节译本,并非全文。在翰林国史院编写各朝实录时,又往往把汉文本《实录》转译成蒙古文,送呈皇帝审阅。如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翰林承旨撒里蛮奏请国史院纂修的《太祖实录》先译成畏兀儿蒙古字呈阅,批准后再定稿,世祖同意撒里蛮的意见。

## 五、《蒙古译语》或《至元译语》的编纂

在建元初年,翻译工作就引起朝廷的重视并设立了专门机构即译馆<sup>[6][P249]</sup>。元代的《蒙古译语》或《至元译语》,以及明代的《华夷译语》,都是为当时社会需要特别是为那些从事翻译工作的人的需求,在当时朝廷的关照下用集体的力量而编纂完成的工具书。《四库提要》认为元《蒙古译语》大概是当时的南人无名氏所记,实乃蒙汉词典,其词汇包括了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等几大类。书中蒙古文,仅是用汉字拼切其读音,同时译成汉文,分类排列。但此书只

粗具梗概,讹漏不少。该词典随也分类对照蒙汉词汇,但比较简单,注音也有的似是而非。

通过上述元朝时期译者文本的选择受到权力操控的实例阐释,可以得知权力是渗透到整个社会机体之中的,具有多重关系,不仅仅意味着自上而下的压制和来自下面的反抗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还有协商与交流。翻译与权力的研究正是以权力多元论为出发点,将人类的文化从单元、二元推向多元的。

然而,权力理论与元朝时期蒙汉翻译活动的结合却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权力理论来源于殖民地文化。在后殖民语境下,存在着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分,强势文化的群体在政治、经济方面同时占据主导,即具有霸权地位。弱势文化群体译介强势文化群体的作品时,由于强势文化的政治、经济及文化霸权,二者之间就会存在权力差异。弱势文化译者就会受到来自强势文化文化霸权的权力操控,总是以原语文化为主导行事。然而在元朝时期,具有政治统治地位的蒙古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相比却属于弱势文化,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促使从事元朝时期蒙汉翻译活动的译史及通事,在译介强势文化的作品时所受到的权力操控力度更加强有力,这是元朝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现实导致的。为了更好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地位,当权者积极地向先进文化学习借鉴,通过强有力的权力操控手段汲取对于自身发展有利的一切文化养分。

除此之外,权力与元朝时期蒙汉翻译活动的结合还具有现实意义。蒙汉翻译与权力理论的结合及其研究还可以帮助拓宽蒙汉翻译研究的路径,进一步扫除此方面研究的盲点,使我们更清楚、更全面地了解翻译的本质。翻译不仅

是一项纯语言活动,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利益冲突,还意味着一种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在另一种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环境里的变形、改造和再创作,从而有助于纠正翻译界对理论与实践的认识误区,将蒙汉翻译研究的重心从“怎么译”转移到“为什么译”上来,不再仅仅咬定翻译文本的微观比较,更注重翻译的宏观研究。理论上的认清对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翻译与权力的关系过程中,必须要辩证地看待权力关系,语言文化权力的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译者应该屈服于文化霸权,对翻译中的权力意识形态操控的描述和揭露并不说明操控是正当的。过于强调社会文化制约可能会导致译者地位的下降,完全忽略它们又可能使乱翻乱译的不良风气盛行。权力关系理论有助于了解翻译的社会文化成因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是对其他论论的有意义的补充,能使翻译研究更为全面和客观。因此,必须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此问题持辩证的态度。

参考文献:

- [1]宋濂.元史·本传[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6.
- [2]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 [3]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M].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平成2年.
- [4]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 [5]叶新民.辽夏金元史徵·元朝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 [6]乌力吉.蒙古族藏文文学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

(上接第100页)[9]d'Aquili E, Newberg AB 1999. The Mystical Mind: Probing the Biology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Minneapolis, MN: Augsburg Fortress.

[10]Samuels PA, Lester D. 1985. D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emotions experienced toward God by Catholic nuns and priests[J]. Psychol Rep. 56:706.

[11]Myer JD.1994.Emotion over time within a religious culture:a lexical analysis of the Old Testament[J].Journal of Psychologist.22: 235- 248.

[12]A.Milevsky,M.J.Levitt,Intrinsic and extrinsic religiosity in preadolescence and adolescence:Effect on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Mental Health [J].Religion &Culture,2004,7(4), 307- 321.

[13]Ellison CG, Levin JS. 1998. The religion-health connection: evidence, theory, and future directions[J].Health Education and Behavior.25:700- 720.

[14]Sandage SJ,Hill PC.2001.The virtue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rapprochement and challenges of an affirmative postmodern perspective [J].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31:241- 260.

[15]McCullough ME.2001. Forgiveness: Who does it and how do they do it?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10:194- 197.

[16]McCullough ME, Emmons RA, Tsang J. The grateful

disposition: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topograph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2(82):112- 127.

[17]McCullough, M. E., Worthington, E. L., & Rachal, K. C.(1997). Interpersonal forgiving in close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321- 336.

[18]Ashton.MC, Lee K.2001.A theoretic basis for the major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J].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15:327- 353.

[19]Bushman BJ, Baumeister R.1998. Threatened egotism, narcissism, self-esteem, and direct and displaced aggression: Does self-love or self-hate lead to violence?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75:219- 229.

[20]Exline J.J, Bushman B, Faber J,Philips C. 2000. Pride gets in the way: Self-protection works against forgiveness. Symp.Soc. Personality Soc. Psychol., Nashville,TN.

[21]Rowatt WC, Ottenbreit A, Nesselrode KP Jr,Cunningham PA.2002. On being holier-than-thou or humbler-than-thee: a social-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religiousness and humility [J].Journal for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41:227- 237.

[22]傅宏.宽恕理论在心理学治疗领域中的整合发展趋势[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4.3:54- 59.